



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文集

在入世与出世之间

星云大师 著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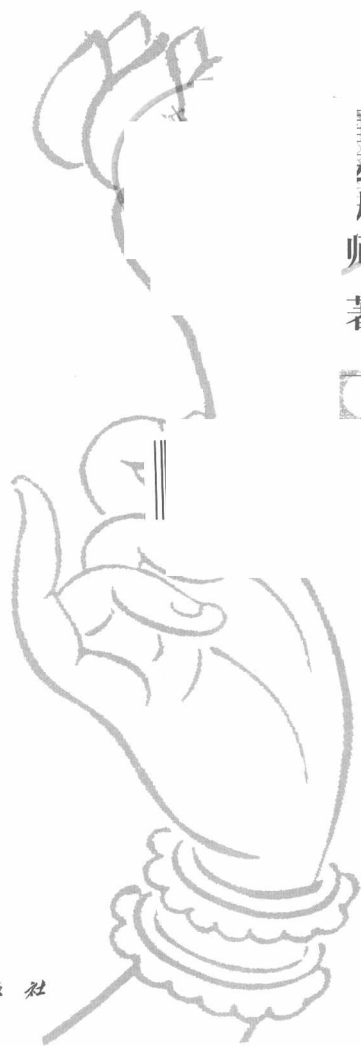


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文集

在入世与出世之间

星云大师 著

下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文集/星云大师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 - 7 - 208 - 09063 - 7

I. 在… II. 星… III. 佛教-文集 IV. 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1888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封面装帧 兰月亮工作室

在入世与出世之间

——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文集

星云大师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52.5 插页 8 字数 698,000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063 - 7/B · 793

定价 98.00 元

第一章	人间佛教的戒定慧(上).....	1
第二章	人间佛教的戒定慧(中)	49
第三章	人间佛教的戒定慧(下)	99
第四章	论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义	150
第五章	从四圣谛到四弘誓愿	166
第六章	六波罗蜜自他两利之评析.....	196
第七章	佛教的慈悲主义	216
第八章	禅门的自觉教育	231
第九章	中国文化与五乘佛法	246
第十章	三皈五戒的人间意义	257
第十一章	佛教的生命学	278
第十二章	佛教的生死学	294
第十三章	佛教的生活学	309
第十四章	欢喜与融和	329
第十五章	同体与共生	334
第十六章	尊重与包容	339
第十七章	平等与和平	346

第十八章	圆满与自在	355
第十九章	自然与生命	362
第二十章	公是公非	370
第二十一章	人间与生活	375
第二十二章	发心与发展	387
第二十三章	自觉与行佛	400
第二十四章	化世与益人	418
第二十五章	中国佛教阶段性的发展刍议	431
第二十六章	佛教兴学的往事与未来	478
第二十七章	山林寺院和都市寺院	500
第二十八章	比丘尼僧团的发展	541
第二十九章	人间佛教的蓝图(上)	552
第三十章	人间佛教的蓝图(下)	590
第三十一章	佛教丛林语言规范	629
第三十二章	佛教与自然生态(上)	666
第三十三章	佛教与自然生态(下)	701
第三十四章	佛教与花的因缘	735
第三十五章	佛教的前途在哪里(第一讲)	761
第三十六章	佛教的前途在哪里(第二讲)	765
第三十七章	佛教的前途在哪里(第三讲)	771
第三十八章	佛教的前途在哪里(第四讲)	788
第三十九章	以忍为力	798
第四十章	生命的密码	806
	星云大师中外文著作一览表	814

第二十五章

中国佛教阶段性的发展刍议

- 一、东传译经时期(秦汉魏晋时期)
- 二、八宗成立时期(隋陈李唐时期)
- 三、禅净争主时期(五代赵宋时期)
- 四、宫廷密教时期(元明皇朝时期)
- 五、经忏香火时期(清朝民国时期)
- 六、人间佛教时期(二十世纪以后)

前 言

佛教发源于印度,经过二千五百余年的流传,到了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

当十三世纪之后,佛教在印度因“印回之争”而同时遭受两教的排斥,致使佛教在印度没落。所幸早在公元前二四九年,阿育王派遣了上千名高僧,包括他的太子摩哂陀与公主僧伽蜜多,分南、北往国外传播佛法(见《善见律毗婆沙》)。其中,南传佛教一直囿限于南亚诸小国,而北传佛教自从传到中国以后,由于汉魏东晋南北朝时代的译经,以及隋唐的八宗成立,大放光彩,影响最为深远。进而中国佛教传入日本、韩国、越南,乃至西方国家;汉传佛教在佛教史上,对全世界一直扮演着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

关于佛教流传的阶段时期,根据《中观论疏》记载,佛世时就有正

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之说。甚至《金刚经》也以佛陀入灭后第一个五百年，乃至第二个、第三个，以及第五个五百年，而有“后五百岁”之说。

民国太虚大师依据印度佛教发展的思想主流，分为三个时期：小行大隐时期（约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大主小从时期（约公元前二世纪至七世纪）、密主显从时期（约公元八世纪至十三世纪）。

其实，佛教自秦汉年间传入中国，至今约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二十个世纪以上），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间的流传与发展，亦可分为如下六个时期，兹简略论述之。

一、东传译经时期（秦汉魏晋时期）

佛教究竟是在何时传来中国的呢？根据《三国志》说，汉哀帝元寿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二年，佛教就已传入了大夏（即今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之间）地区，随后便逐渐传来中国汉朝的首都洛阳。

但是，根据《后汉书》记载：佛教在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六四年），因帝夜梦金人而派遣博士蔡愔等人前往西域求法，以及在《历代三宝记》和《佛祖统记》中，又说佛教东传为永平十年。

关于说佛教是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传来中国的时间之考证，此乃因为在公元前一百三十年左右，我国北方地区的大月氏（又作月支、月氏；其族属学者主张不一，有藏族、蒙古族、突厥族、印度西提亚、氐羌等数说，习俗与匈奴相同）已经早就信奉佛教了。并且有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在《浮屠经》提到了优婆塞、桑门、疏问、比丘、晨门等，这些都是佛弟子的称谓，可见佛教在大月氏国中已经非常普遍了。

其实，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汉武帝北伐匈奴时，西域早已经有军队、商人、僧侣在传播佛教了。甚至根据隋朝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说，早在秦始皇四年（公元前二四三年），当时有沙门释利房等十八位贤者，携带佛经来华，却被秦始皇所拒绝。不过实际上当时民间因为

已经有人在中印之间往来，他们不断地把佛像、经书，经由西域逐渐的传来中国，只是并未引起国家与社会的重视罢了。

如果照上述说法来看，佛教东传从个人零星开始(私传)，应该早在公元前二百至三百年之间。但是，近来中国总是采信汉永平七年之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当时由汉明帝发起，派遣使者请来佛陀的舍利供养，以及佛典《四十二章经》的翻译流传，甚至迦叶摩腾(? 一公元七三，中印度人)、竺法兰(中印度人)来华弘法，这时候佛法僧三宝已经具备(公传)；加之汉明帝敕建白马寺等史实，使得佛教在汉明帝永平年间传来中国之说，更加为人所肯定了。

由此观之，汉明帝之前就已经有民间的私传佛教了；到了汉明帝时，才正式成为国家公传的佛教。

当时，不但汉明帝助长了佛教公传的发展，主要的也因为有大臣、宫妃、民众等，参与佛法的信仰，甚至出家为僧；例如汉明帝的异母兄弟楚王英虔信佛教，更是一大助缘。根据《后汉书》说，楚王英经常斋戒，参与法会，甚至以缣帛供养三宝，可见其对佛法之虔诚了。只是，如果照此说法，佛教东传的时间则已经是在公元六四年之后的事了。

尽管佛教东传的确切年代，异说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有人嗜食胡椒、胡麻、胡桃、胡萝卜等植物；以及过去中国人一向称中国以外的西域人士为胡人，甚至编出《老子化胡经》，此中说明，该时期的一些佛教徒、商人，甚至僧侣在来往西域道中，早已把食物随着佛法逐渐传来中国了。

其实，佛教究竟是什么时候传来中国的呢？也不一定是何年何月何日，总之应该是在秦汉之际，当时就已经有佛教徒在传播佛法了。所以我们现在说佛教东传二千年，就是根据《三国志》，以及《西戎传》所说的汉哀帝元寿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二年。依此之说，佛教东传二千年，和永平七年之说，也不是相距太远，只是端看传播的定准如何看法而已。

佛教东传中国后，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翻译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

佛经《四十二章经》。基本上，两位从印度来华的僧侣，哪能立刻就通晓汉文，此中必然有中国的学者名儒参与。

《四十二章经》的体例，我们对照后来所译的经典，可以看出它不同于某一种经典的体例，乃类似《论语》，是由片段的格言集结而成。但是尽管如此，在佛教初传时期，能有片爪鸿鳞的佛语法言，已经是非常的难能可贵了。

除了《四十二章经》以外，在永平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六十八年到公元七十年，竺法兰又翻译了《佛本行经》、《十住断结经》，这是继《四十二章经》之后最早的佛经。

竺法兰是随迦叶摩腾于永平七年来到中国，经过四、五年对汉文的学习、酝酿，此时从他所翻译的《佛本行经》等经典中，可以看出他的汉学素养应该已经有相当的程度了。

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之后，来华西域高僧有安息国（古波斯，今伊朗）的安世高，月氏国的支娄迦谿、支谦，康居国（西域之古国）的康僧会，以及印度的昙柯迦罗等人。译经高僧来华愈多，也开始有完整经论的翻译。据载：安世高原为安息国的太子，放弃王位而出家求道。他原本就通晓天文与医术，又博综经藏，尤精于阿毗昙学，一生奉持禅经，不但精通数国语言，甚至懂得“鸟兽之声”（见《佛光大辞典》）。来到中国后，很快学会了汉语，从桓帝建和年间到灵帝建宁年间（公元一四八至公元一七二），二十几年之中翻译了许多佛经。其中，较重要而且有影响的是《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道地经》、《人本欲生经》等。所译的经典多属小乘，以宣扬法数与禅观为主，如《安般守意经》是一部禅定修行的指南书，经中指出数息、相随、止、观、还、净等六阶段禅法的过程，对后世修行人在禅观方面的指导，有很大的贡献。

安世高之后，相继的有支娄迦谿（公元一四七一？）、安玄（汉代译经家，安息国人，生卒年不详）、严佛调（汉代僧，临淮〔安徽盱眙〕人）、支曜（东汉译经僧，西域人）、康孟详（东汉译经家，其祖先为康居国人）、竺大

力(东汉僧,西域人)、昙果(东汉译经师)、维祇难(三国吴僧,天竺人,生卒年不详)、竺律炎(三国时代译经僧,印度人)等,也相继翻译了《般若道行经》、《般若三昧经》、《宝积经》、《法镜经》、《首楞严经》、《成具光明经》、《四谛经》、《修行本起经》、《中本起经》、《法句经》等,此中尤以支谦在公元二二八年所译出的《阿弥陀经》,比之鸠摩罗什所译的版本,早了一百多年。

康僧会(?—公元二八〇)是三国时期来华的康居国僧人,也是促使佛教在中国长江以南扎根的重要人物,他在汉魏齐王嘉平三年(公元二五一)译出《六度集经》。在此前后,昙柯迦罗和昙无谿也分别翻译了《僧祇戒本》、《昙无德羯磨》,使得中国的译经事业从经典到律藏,在内容上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到了公元二百六十年,也就是魏蜀吴三国时期的魏元帝景元元年,中国第一位出家人朱士行(公元二〇三—公元二八二,三国魏僧)辛苦的往于阗(西域古王国,位于新疆西部,即今和阗之地)求取《大品般若经》,后经竺叔兰与无罗叉译出《放光般若经》。此经在东晋时代,普遍受到研究,这也是中国有般若经典的翻译之始。

在晋代的汉译经师当中,译经数量最多的,首推西晋的竺法护,他从公元二六五年至公元二七四年间,先后翻译了《宝藏经》、《修行道地经》、《光赞经》、《贤劫经》、《弥勒本愿经》、《普曜经》、《无量寿经》等,一百五十四部三〇九卷的大乘经典。在此同时,竺叔兰又于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翻译了《放光般若经》、《维摩经》、《首楞严经》,甚至在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三二二),帛尸梨蜜多罗翻译的《大孔雀王神咒经》,是为密教的经典翻译之始。

《十诵比丘戒本》是竺佛念(凉州〔甘肃武威〕人)与昙摩持(西域僧,前秦建元年中抵长安),在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公元三七九)所译。五年后,竺佛念又与昙摩难提(兜佉勒国人,前秦建元二十年〔公元三八四〕至长安)译出《中阿含经》五十九卷;翌年,昙摩难提独力译出《增一阿含经》三十三卷。在此之前,鸠摩罗佛提(前秦译经家,西域人,晋武帝时来中

国)已于晋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三八二)译出《四阿含暮抄经》二卷。

在此时期,史称“旧译”的译经大师三藏鸠摩罗什,他在晋安帝隆安五年(公元四〇一),参与了汉文经典的翻译。他最初所译的是《仁王般若经》,继而翻译了《无量寿经》、《思益经》、《小品般若经》等。甚至由于鸠摩罗什在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四〇五)翻译了《大智度论》一百卷,对佛教的贡献尤其巨大。

鸠摩罗什是龟兹人(新疆疏勒),我国四大译经家之一。自幼聪敏,七岁从母入道,游学天竺,遍参名宿,博闻强记,誉满五天竺。后归故国,王奉为师。前秦苻坚闻其德,派遣骠骑将军吕光率兵迎师。途中,吕光闻苻坚败歿,遂于河西自立为王,罗什乃羁留凉州十余年。直至后秦姚兴攻破吕氏,罗什始得东至长安,时为东晋隆安五年(公元四〇一)。姚兴礼为国师,居于长安逍遥园,与僧睿、僧肇等从事译经工作。

自后秦弘始五年(公元四〇三)四月始,罗什先后译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般若经》、《法华经》、《大智度论》、《阿弥陀经》、《维摩经》、《十诵律》等经律论,有系统地介绍龙树中观学派的学说。

罗什通达多种语言,所译的经论,靠僧肇等人的润饰,简洁晓畅,流通极广。一生致力弘通般若系的大乘经典,以及对龙树、提婆系之中观部论书的翻译。所译的经典,对我国佛教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道生传于南方,经僧朗、僧诠、法朗,至隋吉藏嘉祥而集三论宗之大成;再加上《大智度论》,而成四论学派。此外,所译的《法华经》,肇启天台宗的端绪;《成实论》为成实学派的根本要典;《阿弥陀经》及《十住毗婆沙论》为净土宗所依的经论;《弥勒成佛经》促成了弥勒信仰的发展;《坐禅三昧经》的译出,带动了“菩萨禅”的流行;《梵网经》一出,中土依之而传大乘戒;《十诵律》则提供了研究律学的重要资料。因为鸠摩罗什所翻译的经典,包括了经律论,所以历史上称他为三藏的译经法师,且为“八宗共祖”。

以上从公元六十八年,直到公元四〇八年,此近四百年之中,译经的人物大都为西域或印度来华的佛教人士。但到了公元四一八年,中

国的法显以六十八岁高龄到印度求法归来，在晋安帝义熙十四年（公元四一八），先后翻译了《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尼戒本》一卷，以及《大般泥洹经》六卷、《杂宝藏经》、《杂阿毗昙心论》等，共计百万余言。随后有宝云（公元三七六一—公元四四九）翻译了《新无量寿经》二卷和《佛所行赞》七卷，以及智严（公元三五〇—公元四二七）和宝云合译《广博严净经》四卷。

从公元四百年以后，一百二十年间翻译的重要经典，有佛陀什（五世纪北印度罽宾国人）所译的《弥沙塞律》三十四卷、《弥沙塞比丘戒本》、《弥沙羯磨》，昙无讖（公元三八五—公元四三三）的《优婆塞戒经》七卷，求那跋摩（公元三六七—公元四三一）的《杂阿毗昙心论》、《昙无德羯磨》、《优婆塞五戒略论》，求那跋陀罗（公元三九四—公元四六八）的《胜鬘经》，浮陀跋摩（西域人）、道泰（凉州人）合译的《阿毗昙毗婆沙论》六十卷，昙觉（凉州人）、威德合译的《贤愚经》十三卷，法颖（公元四一六一—公元四八二）的《十诵比丘尼戒本》，吉迦夜（北魏之译经僧，西域人）、昙曜（北魏僧，生卒年不详）的《杂宝藏经》十三卷、《付法藏因缘经》六卷，僧伽跋陀罗（北印度迦湿弥罗国人）的《善见律毗婆沙律》十八卷，求那毗地（？—公元五〇二）的《百喻经》，菩提流支（北魏僧，北天竺人）的《深密解脱经》五卷、《胜思惟梵天所问经》六卷，佛陀扇多（北魏译经僧，北天竺人）的《摄大乘论》二卷，闍那耶舍（北周译经僧，中印度摩伽陀国人）的《宝积经》三卷、《定意天子所问经》五卷等。

在以上这许多的人物以外，有一个与鸠摩罗什同为四大译师之一的真谛三藏法师，他从公元五五〇年，到梁陈年间，翻译了《涅槃经本有今无偈论》、《十七地论》、《如实论》、《三世分别论》、《中论》、《金光明经》、《仁王般若经》、《弥勒下生经》、《无上依经》、《立世阿毗昙论》、《金刚般若经》、《俱舍论本颂》、《俱舍释论》、《广义法门经》、《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等，建立了“有宗”的经论依据，堪与鸠摩罗什所译之“空宗”的依据经典相媲美。

真谛是西北印度优禅尼人，博通三藏，究明大乘妙理。南朝梁代中

大同元年(公元五四六)携经典抵中国南海,见重于南朝梁武帝。侯景之乱后,虽辗转流落各地,却仍译经不辍,所译经论近三百卷。尤其他生逢乱世,译经过程倍尝艰苦,几至于千生万死,饮食艰难,生命危殆,却仍致力于义理的阐明。他的学识之广博与译经之卓越,比之于南北朝的鸠摩罗什,以及后期的玄奘、不空、义净,同为我国译经史的泰斗,诚乃实至名归。

从佛教东传中国五百年间,经典的翻译对中华文化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例如,佛教输入,梵文也跟着而来,我国高僧仿造字母应用,所以唐朝僧人守温制作了“见溪群疑”等三十六个字母;今日汉语注音符号,即增损此三十六个字母而成。

此外,梁启超先生说,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我国文学中亦增加了三万五千字以上的新兴名词;又说我国近代的纯文学若小说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有密切关系(见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胡适之先生则说:佛教的译经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造成一种白话的文体,佛寺禅门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见《胡适文存》)。甚至国学大师钱穆博士更明白指出:《六祖坛经》是复兴中华文化九种必读的经书之一(见钱穆博士在台北公开讲演)。

佛经的翻译,对文学乃至建筑、塑铸、雕刻、图画、音乐、印刷、戏剧等中华文化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魏晋时期除了译经事业蓬勃发展,缔造译经盛世外,也有不少重要的佛教著述问世,例如公元四〇四年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同年道生作《百论序》,公元四二八年道生提倡《阐提成佛说》,公元四一〇年僧肇著《不真空论》、《肇论》,公元三六四年道安编著《综理众经目录》等,都是与译经时代的译著,相互辉映。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译经最兴盛的时期,当然译经事业并未到此停止,随着以后隋唐盛世的到来,继有地婆诃罗译出《佛顶最胜陀罗尼经》,菩提流志译《宝雨经》,义净与实叉难陀合译《华严经》,善无畏与一行合译《大日经》,不空三藏所译的密教经典,如《金刚顶经》、《宿

曜经》、《大虚空藏菩萨所问经》，以及唐玄奘所译的《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俱舍论》、《显扬圣教论》等。玄奘大师一生所译的经典总计一千多卷，其与不空、真谛、鸠摩罗什，再加义净等，成为五大译经家，他们对佛教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综观中国佛教发展二千年的历史，应以纪元元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五百年间是为佛教译经事业的高峰，加之后来历朝历代许多高僧大德的艰苦卓绝，孜孜矻矻于经典的翻译，才有后来的“八宗弘扬”时期。

甚至，因为有前面的古德取经、译经之基础，因此才有今日之各种版本的大藏经问世，例如：

《开宝藏》：宋太祖敕令高品、张从信至成都开雕，为我国第一部大藏经。

《契丹藏》：契丹兴宗时敕命在南京开雕。

《万寿藏》：由福州东禅寺住持冲真等人所募刻。

《毗卢藏》：宋徽宗政和二年，由本明、本悟、行崇、法超、惟冲、了一等人募刻开雕。

《碛砂藏》：南宋理宗时，由赵安国、法音等发起，于平江府（江苏吴县）碛砂延圣院开雕之私版大藏经。

《高丽藏》：朝鲜高丽王朝所开版。

《普宁藏》：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浙江余杭南山普宁寺道安、如一等募刻。

《弘法藏》：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敕令于北平弘法寺开雕。

《武林藏》：明世宗嘉靖年间刻于浙江武林昭庆寺之大藏经。

《嘉兴藏》：由密藏道开等发愿，于万历末年在嘉禾楞严寺所刻之私版。

《龙藏》：清世宗雍正十三年敕令于北京开雕。

《频伽藏》：清宣统三年上海频伽精舍用活字排印之大藏经。

《中华大藏经》：一九五六年，为屈映光与赵恒惕等人筹组之“修订

中华大藏经会”所倡印。

《天海版》：日本江户宽永寺之开山天海发愿刻印。

《铁眼藏》：日本黄檗宗铁眼道光所开版之大藏经。

《卍字正续藏经》：日本明治三十五年，京都藏经书院以僧忍澄校订之黄檗本。

《大正藏经》：日本大正十三年至昭和九年，由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小野玄妙等人成立之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辑出版。

《佛光大藏经》：佛光山将经典各种版本重新予以考订、校正，并加新式标点、批注、题解，所编纂出的一部人人适用之现代佛教大藏经。

总之，观古惜今，追忆古德译经的辛苦，竹筒心血，今人岂能不虔诚恭谨的阅藏读经乎！

二、八宗成立时期(隋陈李唐时期)

440

佛教在东土的弘传，从秦汉到隋唐，已有六、七百年之久了，至此经典的翻译已经大致完备，各个学派的基本立场与思想旨趣也已确立，因此先后开宗立派，形成中国大乘八宗齐头并进的佛教辉煌时期。

八宗依其成立先后，分别是：隋朝成立的“法华宗”与“三论宗”；盛唐太宗时玄奘大师的“唯识宗”、善导大师的“净土宗”，以及唐高宗时道宣律师的“律宗”，武则天时法藏贤首大师的“华严宗”，及至神秀大师与惠能大师南顿北渐的“禅宗”之后，“密宗”成宗立派最迟，那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的事了。不过，基本上八宗都是在隋唐时期所创立。

说到法华宗，这是智者大师(公元五三八一—公元五九七)依《法华经》为主要依据而开创；因为他居住在天台山国清寺，故而又名天台宗。

智者大师(智顓)是隋炀帝菩萨戒的老师，十八岁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之后到各方参学，廿九岁进入天台山，弘传法华三十余年，每年讲说《法华玄义》及《摩诃止观》。一生“止观等持”，重在修学“法华三昧”，而其手著《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为法华宗所依据的三部主要论典。由于教理和实践兼备，史称“教观双美”。直到明代智旭藕

益大师(公元一五九九—公元一六五五)著述《教观纲宗》，以教观兼备之天台教学立场阐释教观二门之纲要。在天台的教判中，更把法华称为如来一代圆教。

法华宗虽为智者所创，但一般皆溯源于龙树菩萨(约三世纪左右)造《中论》、《大智度论》，北齐慧文大师(年寿不详)读之，悟“一心三观”之旨；后传南岳慧思大师(公元五一五—公元五七七)，并悟“法华三昧”而得六根清静。智者大师从慧思修习，得法华三昧之前方便，乃传其观法，且依法华而广宣教义，进而创宗立派，故后世有尊龙树、慧文、慧思亦为法华宗之祖师者。

智者大师门人颇多，其中灌顶(公元五六—公元六三二)师事智者二十余年，大师的思想多经他传播而得以流传，撰有大般涅槃经玄义及疏、观心论疏等数十卷。后来并继承师志建国清寺，至今寺内有古梅一株，相传为灌顶大师所种。

灌顶之后传承三祖智威(?—公元六八〇)、四祖慧威(公元六三四—公元七一三)、五祖玄朗(公元六七三—公元七五四)；玄朗之下有六祖湛然(公元七一—公元七八二)。湛然是为中兴天台的功臣，近代的谛闲大师(公元一八五八—公元一九三二)之后，有倓虚大师(公元一八七五—公元一九六三)在青岛湛山寺创湛山佛学院，以及慧峰法师在台湾建湛然精舍，都是为了纪念湛然大师之行谊与德业。

与天台宗同时建宗的是三论宗。三论宗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主要立宗的根据。一般人都以印度的龙树、提婆(三世纪)为宗主；佛教东传中国以后，因为鸠摩罗什翻译《中论》、《大智度论》等，而被尊为宗主。

鸠摩罗什之后，僧肇(公元三八四—公元四一四)、僧朗(约南朝齐、梁时)、僧诠(约南朝梁时)、法朗(公元五〇七—公元五八一)、吉藏(公元五四九—公元六二三)等大师，都是三论宗的弘传者，但一般人认为吉藏嘉祥大师是为三论宗开宗的大师。

吉藏俗姓安，祖先是安息国人，后来父亲迁居江南，他本人出生在

南京，七岁出家，十九岁即学有所成，善于讲说经论，曾住持江苏省栖霞山寺，也曾住过浙江绍兴嘉祥寺，在嘉祥寺弘扬三论宗达十五年之久。著有《三论玄义》、《三论疏》、《二谛义》等。

三论宗的祖庭，一般人认为应该是鸠摩罗什住过的山西草堂寺，实际上三论宗是吉藏大师所创，因其住于浙江绍兴嘉祥寺，年月既久，又弘扬三论，因此若说三论宗的根据道场是嘉祥寺或栖霞寺，也未尝不可。

继隋朝建立天台宗、三论宗之后，唯识宗是唐朝最初成立的宗派。唯识宗是玄奘大师(公元六〇二—公元六六四)弘扬和翻译唯识学，后由窥基大师(公元六三一—公元六八二)所创立。当玄奘大师未到印度之前，他对唯识学的经论，早已广为涉猎、研究，但因有限的经典不能满足他的思想，因此到印度留学十七年，亲近那烂陀大学的戒贤论师(约公元六世纪)，带回许多唯识学的经论，经过二十余年的翻译，终于使唯识宗的经论大备。

在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玄奘大师主持慈恩寺佛经译场，总共译出经论七十六部一三四七卷，尤其著作的《八识规矩颂》，共四章十二颂四十八句，概述唯识学说，成为青年学者修学唯识学的入门之书。

门下弟子以神昉(生卒不详)著《唯识文义记》，玄应(年寿不详)著《唯识开发》，圆测(公元六一三—公元六九六，朝鲜人)作《解深密经疏》、《成唯识论疏》，新罗僧太贤(世寿不详)制《唯识论古迹记》等；而窥基绍承玄奘嫡统，住长安大慈恩寺，提振教纲，世称慈恩大师，著有《瑜伽师地论略纂》、《成唯识论述记》及《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大乘法苑义林章》等，集唯识宗之大成。

唯识宗虽然在宋元明之后慢慢衰微，但在清末民初因为杨仁山(公元一八三七—公元一九一一)、欧阳竟无(公元一八七一—公元一九四三)、太虚大师(公元一八八九—公元一九四七)、韩清净(公元一八八四—公元一九四九)等人的弘扬，全国佛教学院都采用唯识学为教材，因此至今唯识学在佛教学术研究的领域中，仍然以其超越现代心理学，不但具有科学的论